

吉林省考古文集

1949—1979

上

張揚
張揚
張揚

修
老
新
原
統
之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編



目 录

综合论述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

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主要收获	1
吉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
吉林新石器文化的三种类型	29
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	41
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	63
白城地区考古调查概要	78
高句丽壁画石墓	83
集安附近高句丽时代的建筑	109
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	119
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	127
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	133
农安县伊通河西岸文物普查记	157
吉林省十年来考古工作概况	171
吉林双辽县考古调查报告	185
辉南县文物普查工作简报	199

吉林省前郭、扶余、德惠考古调查	205
一九六二年春季吉林集安考古调查简报	219
记双安、吉林出土金“会州刺史”官印	225
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	227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 ——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 三十年的主要收获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建国三十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遵循“古为今用”的正确方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

早在1949年，当人民解放战争还正在胜利进行，吉林市西团山原始墓群的清理发掘工作就已经有组织地开展起来。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机构不断健全，队伍逐渐壮大，重点文物得到较好保护，田野工作和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形势是令人鼓舞的。

通过1960年和1975年两次大规模文物普查和历年调查，发现古代遗址、城址和墓群等共2000多处，基本上摸清了全省境内文物分布的状况和历代文化的概貌。配合基本建设和根据科学研究目的部署的清理发掘工作，更使我们对吉林省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

吉林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历来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考古资料证实，“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活、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这里的历史文化与中原古代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血肉联系。古代以肃慎、东胡、

~2~

挹婁、沃沮、鮮卑、勿吉、靺鞨、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族等名称出现的许多兄弟民族，与汉族一起，为开发祖国东北，创造祖国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吉林省古代各族创造的丰富多采的文化遗产，生动地记录着这一地区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和巨大的创造力，是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历史的有力见证。

一、

1951年在榆树县周家油坊的河滩上，拾到人类头骨碎片两块、胫骨一根和一片打制石片，同时还采集到大旁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这一发现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77年秋，吉林省地质研究所、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再次来这里，在河边一级和二级阶地上发掘到一批打制石片、骨片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经C14测定已有四万至七万年历史，证明这一带蕴藏有比较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但由于采集的人类骨骼曾经过自然搬运，没有地层依据，而头骨碎片经含氮量分析又有可能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所以，能否以这批人骨遗骸命名“榆树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吉林省最早人类遗骸的确凿资料，是1978年在整理安图明月沟洞穴的堆积物时发现的。安图明月沟洞穴位于布尔哈通河边，是一个岩溶洞穴。1963年发掘出土了相当数目的动物化石，经鉴定计9科11属16种，其中有的动物骨骼化石上还清晰地保留有人工凿击的痕迹。根据猛犸象、被毛犀动物化石C14测定，距今已有二万六千年以上，洞穴堆积的地质年代应为更新世晚期。在室内整理堆积物时，发现一枚成年人类的右下第一前臼齿，可据以确定存在有“安图人”。明月沟洞穴是“安图人”棲身之所，而同时出土的各种化石动物，则是他们猎获生活资料的一部分。

榆树和安图^①的发现证实，最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吉林省大地上就已经深深印上了我们祖先的足迹。

盛行细石器技术传统，普遍经营畜牧，是吉林省西部原始文化的显著特色，其东界一直可延伸到中、东吉林、长春一带。扎赉特旗出土大角楔形和船底形的扁体石核表明，这一地区的细石器技术传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由华北发端的细石器技术传统向东北亚传播的重要环节。这里的细石器技术传统经历过较长的发展过程，并曾作为不同文化的构成因素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就吉林省西部地区来说，有种种迹象证明，其遗迹甚至可以绵延到辽代前期。

大安^②东山头和汉书下层墓葬中发现有铜器，年代约当春秋战国时期，可能代表了这一地区渔猎畜牧类型的原始文化较晚时期的面貌。墓葬多浅坑竖穴，男女合葬，随葬有陶器、铜器、骨器和蚌壳。有的陶器外涂红彩。铜器有蹲踞兽形牌饰、刀、扣、环等小件红铜制品。以大安汉书遗址上层命名的“汉书文化”，已经出现房屋，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同时还出土有铁器，年代更晚，约当战国至汉。汉书上层的房址主要是半地穴式的，有斜坡门道、成排柱洞和固定的灶址。房子边上往往有圆筒形窖穴，其中曾发现过糜子一类粮食。石器较少，有磨制的斧、锛、凿和锺斧、骨器工艺比较发达，有锥、镞、矛、鏃、匕、纺轮、箭和穿孔骨片（甲？）等。铜器除刀、镞、扣之外，还发现过陶质和石质的铸范以及青铜短剑后下石质的靴状物。出土的铁斧、铁刀与中、晚战国至汉代的器形相同。陶器以泥质红褐陶为主，仅有少量夹砂，器形有鬲、罐、壶、钵、杯、支座和船形器等，表面多施装饰，主要有按压的绳纹、篦点纹和红色彩绘。彩绘除大面积涂红外，还有条带纹、雷纹、云纹、三角勾纹、网纹和三角形组成的几何图案，鲜明地显示出中、晚

~4~

古代文化的形响。汉书文化在扶余长岗子也有发现；而陶四涂、涂红、衣这种文化因素。在长春地区北平松花江流域一些遗址中也常能见到。从地域和年代上分析，这些遗存可能与东胡——鲜卑族系的活动有关。X

吉林省中平吉林、长春地区原始遗存相当密集，目前掌握的已达百余处。这些遗址包括早、晚两种类型。早期的主要遗址有吉林市二道岭子、虎头砬子、张家湾和长春市郊的杨家村、庙山、红咀子、黑咀子等，其基本内涵是打制石、磨制石和类似沈阳新乐文化中带之字形瓦纹的砂质褐陶。

吉长地区较晚的原始文化是一种以西团山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经过清理发掘的重要遗址和墓地有吉林市西团山、两半山、长岭山、骚达沟、土城子、永吉旺起屯、星星哨、杨屯、学古东山和蛟河山头屯等。其中土城子、学古东山和杨屯遗址上层已进入汉代，出土过汉代的铁器和轮制灰陶。居住遗址多分布在江河岸边山坡上，平地上的年代稍晚。房址多为圆角长方形的半地穴，上坡以穴壁为墙，下坡用石块叠砌。屋内地面多经焙烧，有石块围筑的灶址，有的屋内还有窖穴。成排的房址组成为原始的村落。墓地多在较缓的山坡上，以石块或石板砌成石棺，有的还有盛放陶器的副棺。葬式多仰身直肢。有的石棺随葬有猪下颌骨，数量不等。男的多随葬镞、斧、凿等，无纺轮；女的多随葬纺轮和石刀，无石镞，可以看出性别分工的情况。骚达沟墓地石棺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寡比较悬殊，反映了贫富已经分化。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有斧、斨、凿、刀、磨盘、矛、镞、剑和环状石等，以长大的半月形石刀和棒状石斧最富特色。长春地区则多见束领或束腰的锄和铲。青铜器数量不多，有矛、短剑、刀、斧、扣和连珠形装饰品，直刃的矛和短剑，形制与中原器物相似，双曲刃式的则具有东

北地方色彩。陶器为手制素面的砂质褐陶，有鼎、鬲、豆、甗、壶、罐、碗、钵、盂等。筒腹锥足鼎、分裆撇足鬲、桥状横耳壶都很有特点，而鼎、鬲、豆、甗等四形，则显然是来自中原或在中原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类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以较发达的原始锄耕农业为主，种植粟、黍一类耐旱作物；饲养的家畜主要是猪；渔猎仍是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补充。墓葬中曾发现过麻布，可能是当地织造的。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西团山墓地的人骨经鉴定属于蒙古人种的通古斯种。一般认为“西团山文化”是肃慎或挹婁的文化遗存，但也有认为是属于涉貊——夫余的。长蛇山遗址出土的木炭经 C_{14} 测定为 $405 \pm 85 \text{ B.C}$ ，杨屯下層经测定为 $205 \pm 90 \text{ B.C}$ ，都与考古材料推定的年代大体吻合。

吉林省东部延边地区，特别在图们江及其支流两岸，分布有丰富的原始文化遗存。解放后清理发掘过的重要地点有琿春大六道沟、一松亭、汪清百草沟、新安岗、新华岗、复兴岗和延吉的船口村等。

大六道沟遗址位于临水的小山顶上，揭露出来的房址多长方形半地穴式，四角分布有均衡的柱窝，无门道。屋内没有灶址，仅见篝火痕迹。石器多打制，相当粗糙，有斧、锛、砍砸石、刮削石等，不规则的石片数量很多。陶器以素面抹光的红褐色或红色砂质陶居多，有甗、罐、碗、钵、杯等。同类性质的遗址在琿春的圈河和解放村也有发现，是这一地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年代应较早。

东宁地区发现的其它原始遗存，文化面貌都很相似，属于一种很不发达的青铜文化，晚期如一松亭遗址则可能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其年代下限可达汉代前后。房址为长方形或方形的半地穴，有斜坡或门道，屋面分布有柱洞或础石，以石块

~6~

围筑灶址，有的还有灶台，东面和北面设置的“馐道”，应是锥形的火炕。墓地多在山坡和山麓，均石扩墓，有单人葬亦有男女合葬。石口以磨制为主，有斧、斨、刀、镰、矛、剑、镞和花冠状石口等。其中长方形石斧、长身石矛和花冠状石口颇有特色。此外还有少数压琢加工的黑岩石口。骨口相当流行，有镞、剑和矛等；百草沟还发现过未经钻凿而烧灼过的羊卜骨。铜口出现过铜扣，也曾出土过炼渣。陶口均手制素面，多粗砂褐陶，形体厚重，有瓮、罐、杯、钵、豆、甗等，筒形口和柱状口耳比较流行。在汪清罗子沟还曾发现过用桦树皮缝制袋子贮存谷物的遗迹。这类遗存的经济生活应以农业为主，但渔猎亦相当发达。豆、甗等口形和卜骨的出土，可以看到这一地区原始文化与古代中原文化的关系。至于它的族属，有人提出应当属于沃沮。

吉林省东南部浑江流域的原始文化面貌与延边地区比较接近。遗址间距十余里或二、三十里不等。生产工具多打制石镐和网坠，石斧也呈板状长方形，石矛亦偶有发现。陶口均素面手制的粗砂陶，呈褐色或黑色，多罐形口和豆形口，盛行竖耳，不见鼎和鬲。有人认为这些遗址应反映着高句丽族早期的活动情况。吉林省西、中、东部的原始文化虽然各具特点，但又都显示出与中原古代文化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伟大祖国远古文化的统一性。与中原相比，这些原始文化延续的年代较长，一般可抵汉代。这种现象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在这一地区的反映。

二、

吉林市东团山至龙潭山一带山麓台地上曾发现过西汉的村

落遗址和墓葬。解放以后，又在江北土城子、杨屯和学古东山发掘到许多汉代的陶器，学古东山还出土了铁镢、铁凿、铁砬、铁椎、铁矛等一批汉代铁制农业工具、手工工具和武器，证明汉代遗址不但远抵吉林市北郊，而且在这里分布得相当稠密。吉林市原始文化晚期遗址中有不少陶器是仿照汉代陶器的形制烧造的，如长颈瓶、豆和钵等，反映了当时吉林省中下地区的原始文化由于汲取了新的滋养，社会生活曾出现过显著变化。汉族居民、汉代文化对于促进祖国东北历史的发展曾发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

三.

吉林省东南的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是古代高句丽族聚居的地区。集安是高句丽前期都城的所在地，境内“多大山深谷，无原泽”。历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跋山涉深谷，对这一带高句丽遗迹展开了比较全面的考查。

《资治通鉴》卷97称“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润，南道险狭。”通过调查，确定了文献上的北道和南道，所指大抵正是今由鸭绿江畔集安县城向西去往图们江边的两条主要通路。北道上，利用深险峡谷构造的关马山城堵截着通路；南道上则有居高临下扼守新开河口的龟王朝山城和横卧在偏僻孔道上的望波岑关隘。另外，还对县城北五里许的九都山城进行了复查。这些石材构筑的坚固的城堡和险要关隘拱卫着当年的国内城，构成了高句丽前期都城的严密屏障，使人们对高句丽时期的形势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印象。

1958年在集安城东清理了一组建筑群，石材奠基，原复红瓦。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面阔两间，东西宽40，进深20米，布

~◎~

列有花岗岩雕琢的柱础，瓦当有兽面纹、忍冬纹和连瓣纹数种。四周绕有迴廊，可与别的建筑相通。屋内正中置一方形巨石，靠墙有曲尺形火炕，烟道埋在地下。这座布局严整、结构匀称的建筑，很可能是四世纪后期刁句丽祀奉土地的社址。

集安县境内发现的刁句丽墓群共三十多处。墓群色彩的墓葬数目从几座到几十座不等。比较开阔的盆地如长川、良民、刁地等地方可达二百座左右，县城附近最平敞的地带从下解放到麻线沟的山坡和河滩上，墓葬尤其集中，总数在万座以上。从墓群分布状况，大体可以窥见当年“随山谷以为居”的刁句丽人口的一般布局。

过去对于刁句丽墓葬多只根据坟墓的外观简单区分为石墓和土墓两类。对良民和通沟两个墓葬调查和清理的结果，使我们对刁句丽古墓的类型及其错综发展的过程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刁句丽墓葬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共九种：一类是石墓，包括积石石圪墓、有坛积石墓、阶坛积石墓、阶坛积石洞室墓和阶坛积石石室墓等五种；另一类是土墓，包括有坛封土石室墓、阶坛封土石室墓、封土洞室墓和封土石室墓等四种。各种各类的墓葬，体现了不同世代的不同葬俗。尽管各种不同的墓葬在时间上会有并行交叉等现象，不可能以单一的形态截然取代交替，但它们演进的序列大体还是清楚的。在良民墓群的山坡上，有坛积石石圪墓的基坛往往只修在下坡，显然是一种防止封石流失的设施。在坡度陡直的地方，由于下坡的基坛相当高，很易坍塌，于是又在基坛外侧筑一道甚至数道倚护的矮墙，遂呈现出阶坛的形式；而阶坛积石石圪墓的阶坛，有的固然是由周围倚护的矮墙形成的，有的却是自下而上逐层累筑起来的。这些现象对于从根本上阐明刁句丽石墓形制的演进，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启示。

一批五世纪至六世纪壁画古墓的清理，是辽句丽考古的重要收获。新发现的古墓壁画，不但为美术史册增添了绚丽的彩页，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而且也为研究辽句丽社会生活提供了大男形象鲜明的画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禹山41号壁画墓是一座五世纪中晚期的阶坛积石洞室墓，它证明过去有人以427年迁都为界，把辽句丽分成石坟时代和土坟时代两个阶段，并认为壁画都只保存在土坟中等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约当五世纪中期的长川一号墓，是迄今发现最重要的辽句丽壁画古墓之一。这座墓分前后两室，前室北壁的歌午百戏和狩猎图象，内容繁富，细节生动，是其它辽句丽古墓壁画很难匹比的；尤其是前室藻井下下墓主人礼佛的场面，一佛着通肩大衣趺坐在须弥座上，左右蹲伏护法的狮子，两侧各有一列璎珞冠冕的供养菩萨，将佛教仪式作了极其鲜明而直观的表现，这在辽句丽古墓壁画中还是仅见的一例，表明佛教自四世纪由前秦传入辽句丽之后，曾迅速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得到了反响。通沟第十二号墓壁画上的屋宇画得十分细致，有助于了解辽句丽五世纪建筑的具體结构，而画师挥笔作画、墓主人戎装斩将等画面，都是首次展现的当时社会生活场景。通沟五盘坟四号墓和五号墓是辽句丽六世纪王族的陵墓，四壁绘画以四神为主题，藻井上则布满了中原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伏羲、女娲、神农氏和伎乐天等形象，布局严谨，技法娴熟，造型生动，色彩富丽，线条遒劲流畅而又有变化，代表了辽句丽绘画艺术的顶峰。如果说五世纪的辽句丽壁画多只在构思和表现技法方面流露着汉墓壁画的旨趣，那么到了六世纪，整个壁画的面貌，从描绘对象到人物服饰，更与当时中原某些壁画如出一辙，可以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文化对辽句丽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辽句丽古墓多经盗掘，出土文物自來很少。清理遗址和古

~10~

墓积累的一批文物，为全面认识多句丽的文化面貌增加了新的内容。铁口在多句丽相当普遍，出土的钁、凿、铤、镰、锤、斧等器物表明，多句丽使用着一套形制与中原汉魏时期相同的农具和手工工具。除冶铁和制陶而外，釉陶和鍍金是多句丽比较重要的两个工艺部门。釉陶多红胎，施土黄色、黄绿色或暗绿色釉，宽唇展沿四耳壶是釉陶中别具风格的常见四形。鍍金口物多为铜制马具，制作精巧，纹饰美丽，达到很高的水平。禹山68号墓和七星山96号墓出土鼎、甑、釜、洗、镬斗等铜口，在多句丽古墓随葬品中是非常罕见的，形制与东汉至魏晋时期关内广泛使用的铜口完全相同。集安粮库出土的白玉耳杯，形制与汉代耳杯一致，质料经鉴定是新疆和田产的玉石核心。集安出土陶砚有两种：一种多厚方盃，在一角有贮水的圆洞，很象一种汉砚；另一种呈圆形，周围以沟槽贮水，与魏晋流行的辟雍砚相同。以上诸端无不证实，多句丽与古代中原各族具有密切的联系。

在延边地区保存有许多唐代渤海建立的城址。渤海前期的都城旧国（忽汗州，今敦化敦东城）和五京中的东京（龙泉府，今珲春八连城）、中京都会集在这一带。这些城址仿效唐代中原城市的格局。一般都有方套的墙垣和套仿勾里坊，重要宫殿和官署多集中在北门。州一级的城址规模稍小，府一级的城址周长都在五里以上。牡丹江流经的谷道是当年旧国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之间的道路，这一带发现的山城和“二十四块石”遗址，反映了渤海首府的防御体制和前期王族归葬旧国的一些风习。通过历年来多次调查和深入研究，还确定了和龙西古城是渤海中京显德府的所在地，纠正了过去多将桦甸苏密城当作中京城址的错误判断。苏密城应是渤海“营州道”上的重镇长岭府。

1973年在琿春马滴达清理了一座塔基，揭示了渤海与中原一样盛行佛教的一个侧面。地表废墟中堆积的各种各式或素面或印有花纹的灰砖表明，整个砖塔建筑曾经过缜密的设计，各部位用砖都是作为一定规格的固定构件专门烧造的。塔基的地窖是一个方正而宽敞的地下建筑，顶下四周为举折不大的平行叠涩，壁面抹白灰，向南有门，可拾级通向地面。

1949年在敦化六顶山发现的贞惠公主墓，是渤海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认识渤海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贞惠公主是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的女儿，墓中出土有石狮、墓碑、玉璽、金铜口和陶口等许多珍贵文物。石狮的造型与唐乾陵前石狮非常相象，只是形体稍小而已。墓碑是用唐代标准的楷书刻制的一篇碑体文，立于780年，是今存唯一的渤海石刻文字，证明渤海使用汉字，擅长书法，谙习中原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碑文还使我们得以确定，六顶山墓群是渤海前期王族的墓地，敦化敦东城是渤海前期都城旧国的所在地。

1971年在和龙西古城南四公里的河南屯古城中清理了一座夫妇并葬的渤海贵族墓，出土有大男贵重而精美的黄金制品，包括镶嵌水晶和绿松石的鞞鞞带饰、刀鞘饰件、金钗、金钏、金耳环、金花饰等，其工艺、形制、花纹和风格都与今西安一带出土的唐代金制饰物相似。对照史书记载，唐朝最高统治者曾多次将“紫袍金带”赐赠渤海王室贵族，这批华贵的金饰很可能来自中原。墓的封土上原来有建筑物。建筑物倾圮后，许多建筑饰件和残破的土坯墙块都堆集在墓前的土坑中。有的墙块的白灰壁面上保留有用彩色描绘的祥云、卷草、忍冬、莲花等图案，第一次向人们展示出渤海绘画的画儿和简洁的壁画艺术风格。

艺术风格。

和龙北大地墓群清理的五十多座墓葬，为研究唐代渤海的

埋葬风习和社会状况提供了一批比较完整的资料。北土地的墓葬均先挖出浅穴，四周用石块砌壁，然后再盖顶石加封土，墓室中多有木棺。大致可分三种形式：一种平面作凸字形，一般规模较大，中间突出部分为甬道，墓室中往往置一棺或双棺，有的还在一端、一侧或一角置二次葬的骨殖，可多达十具。第二种作刀字形，规模比第一种小，甬道偏置一侧，也有二次葬的现象。第三种呈长方形，除葬入尸体之外，有的还有一至三具二次葬骨殖。有的尸体一次葬入，占居墓室主要地位；有的尸体则以二次葬的方式附在一旁，是北土地墓群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松漠纪闻》卷26称：“渤海国……其王旧以大姓，右姓曰高、张、杨、奚、乌、李，不过数种，下曲、奴婢无姓者皆从其主。”实行二次葬的，很象是无姓而隶属王族右姓的下曲和奴婢。

五.

曾经统治过北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辽代，把吉林省以西平壤到东平山区都直接与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联成为一个整体，并将大量以汉族为主的俘虏迁入东北，在历史上对于加速祖国东北的开发和建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由于辽代有“因俗而治”的政策，于是往往容易使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当时只在平壤至燕云十六州地方才有较高的文化，而北方草原深处则仍然因循着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什么进步。然而，矗立在吉林省中平壤和以西平壤的百余座城址差不多全都兴建于辽代，这一事实足以表明上述认识是不全面的，更何况这些城址中出土大量遗物也雄辩地说明，这一带在辽代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或交通，确实都有相当高度的发展。

吉林省境内重要的辽代城址很多，其中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而引人注目的有前郭他虎城（长春州）、怀德秦家屯古城（信州）、扶余石头城子古城（宁江州）、洮安程四家子古城（泰州）、梨树偏脸城（经三迁之后的韩州）、科左后旗浩坦古城（最初的韩州）、科左前旗东方红古城（金山县）、科右中旗吐列毛都古城和扎鲁特旗格日朝鲁古城，等。这些古城附近还分布有一些较小的城址，以中下地区为例，几乎每隔二十公里左右即可遇到一座。调查资料证实，周长在四公里以上的都属府城或节度使州州城，刺史州州城一般不足三公里。比较小的城址则应为当时的县城。这一带辽代城址多保存的相当好，有清楚的墙垣，夯土版筑，形制整齐，均有瓮城、角楼、马面的设施。这些古城中出土的铁器有农业工具、手工工具、马具和铁锅等生活用品，表明辽代在西辽河以北广大草原已广泛使用铁器，并且出现了以铁器耕种的农业。古城中出土的瓷器有中瓦输入的，亦有当地烧造的。当地烧造的瓷器多仿定窑制品，质地稍粗松，洁白程度也稍低。此外还有仿唐三彩的辽三彩器和釉陶器。辽代的器形除鸡冠壶等个别器形而外，多与中原的器形相同。辽代铸币不多，城址中出土的货币多北宋钱和开元钱。

辽代统治者崇尚佛教，曾到处修塔建寺。农安县是辽代东下重镇黄龙府的所在地，县城西门外耸立着高10米，中实砖造，八角十三层的农安塔，相传是辽圣宗时的建筑。1953年修缮时，在塔上中下中心一小砖室中发现铜佛两尊，以及木制圆形骨灰盒、瓷香盒、瓷香炉、银质小盒和单线刻画佛像的银牌等。其中瓷香盒在白地上施褐彩搅釉花纹，密密层层地呈花冠形展开，极其工丽精致，是辽瓷中难得的珍品。1970年还对农安万金塔的塔基进行清理。塔基下有叠涩盘顶的方形地宫，墙面抹白灰，

原来绘有白描的壁画。地宫中出土遗物有施红、橙、蓝、绿、黑、白等彩色的石雕小塔，或银质舍利盒的薄铁小塔和木桌、瓷口、铜箸、铜匙、铜镜、铜钱以及锁绣钉花的织物残片等。其中木桌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方桌之一，是研究家具史的重要资料；铜匙经鉴定为白铜，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白铜制品之一，对研究冶金史具有重要意义。

吉林省中辽和西辽的辽代墓葬，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有的为石造墓室，有的为砖造墓室，有的埋葬，有的火葬，有的以蒙古色式的陶屋盛骨灰，有的以雕造的石室盛骨灰。呈现这样复杂现象的原因，有的应当与僧俗对死者的不同处理有关，有的则应当与辽代在这一带聚居着汉、契丹、渤海、女真等许多不同民族有关，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而墓葬规模悬殊，精工与简陋的差别，则无疑是与当时阶级关系相联系的。

金代的窖藏在集安、怀德、吉林、靖宇都有发现，出土多铁犁、铁叉、铁锄刀等农具和铁锅、烙铁、铜镬斗、铜戥斗、铜镜等生活用具，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带生产情况和生活面貌在许多方面与中辽相同。前郭、扶余、农安一带还经常发现大批金代窖藏的货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宋代铸造的。省内搜集到不少猛安、谋克铜印，均用九叠篆字阳文，形制与宋代官印相同，反映了金代社会组织 and 军事组织的状况。

舒兰小城子一带是包括完颜希尹墓在内的金代早期贵族墓地。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将、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统治阶级埋葬风习对女真族的影响。扶余发现的一座墓葬，使我们对金代早期女真贵族的葬制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鍍金帽顶和磨制工细的金扣白玉带，代表了金代初年相当精湛的工艺水平。